

近世浙赣民众为何“健讼”

——小川快之《传统中国的法与秩序》读后

赵晶

学术的发展自然需要多视角的融入,只是离开了日本学者原本擅长的制度考证之后,这些著作如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、如何有效地完成自问自答,尤其是能否达致“作为方法的社会史”的高度,就成为检验这些成果的相应标准。小川氏的研究揭示了诸多以往研究未曾触及的层面,但又累于自己建构出来的理想社会模型,使得相关结论简单化、解释路径单一化,这应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吧。

一

梅原郁于2006年出版的《宋代司法制度研究》,于2010年获得日本学士院赏,这一象征日本最高学术荣誉的标识将“本格”的制度史立场的日本宋代法制史研究推到了历史的顶峰。曾受教于梅原氏的简牍学、秦汉法制史名家富谷至曾以“正宗的北辰一刀流”来比拟这种研究(《文書行政の漢帝国?あとがき》,名古屋大学出版会,2010,頁444)。顶峰学者必然需要忍受寂寞,这是“独孤求败”的无奈,毕竟并非任何时候、任何领域都能有幸出现“天才总是成群地来”的繁荣景象。

2006年之后日本出版的与宋代法制相关的著作(此处采用严格意义上的“法制史”立场,不包括官僚制度等),据笔者目力所及,除了与宋代书判相关的四种日文译注(清明集研究会:《〈名公書判清明集〉(官吏門)訳注稿》上,2008;《〈名公書判清明集〉(官吏門)訳注稿》下,2010;高橋芳郎:《訳注〈名公書判清明集〉官吏門・賦役門・文事門》,北海道大学出版会,2008;《黄勉齋と劉後村 附文文山——南宋判語の訳注と講義》,北海道大学出版会,2011)外,专著仅有小川快之《伝統中国の法と秩序——地域社会の視点から》(汲古書院,2009)、青木敦《宋代民事法の世界》(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,2014)和大泽正昭《南宋地方官の主張——

〈清明集〉〈袁氏世範〉を読む》(汲古書院,2015)。

三本专著至少拥有三个共同特征:其一,以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为主要史料之一,其中小川氏常年参加大泽氏主持的清明集研究会,上述日文译注亦见他们二位的贡献;其二,论旨多出于社会史的立场,尤其是关注地域性元素,如小川氏与青木氏都将讨论主题聚焦于江西,大泽氏则通过数据统计,标举了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中的福建元素;其三,或多或少以地方官或士大夫的群体或个体为考察对象。类似的努力,亦可见于近藤一成《宋代中国科擧社會の研究》(汲古書院,2009)与中砂明德《中国近世の福建人——士大夫と出版人》(名古屋大学出版会,

2012)的部分章节。

总而言之,由制度史立场出发的研究,或许只剩下辻正博兼论唐宋的《唐宋時代刑罰制度の研究》(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,2010),这大致反映了日本学界的基本研究态势。学术的发展自然需要多视角的融入,笔者也无意呼吁严守制度史立场的法制史研究,只是离开了日本学者原本擅长的制度考证之后,这些著作如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、如何有效地完成自问自答,尤其是能否达致“作为方法的社会史”的高度,就成为检验这些成果的相应标准。拙评《如何更好地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——评大泽正昭〈南宋地方官の主張——清明集〉〈袁氏世範〉を読む》(包伟民、刘后滨主编:《唐宋历史评论》第4辑,社会

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8)业已触及这些问题。由于“健讼”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,笔者在拜读了诸多学者的论述之后,也有一些感想,谨此藉由对小川氏著作的评述,聊作发挥,以就教方家。

二

小川氏的著作由序言、第一章“健讼研究与问题所在”、第二章“宋代信州矿山纠纷的图景”、第三章“宋代江西、江东饶州的纠纷与诉讼”、第四章“宋代明州沿海地区的纠纷与秩序”、第五章“明代江西的开发与社会秩序”、结论、附录《书

(下转14版) →

← (上接12版)

家聚会,逢遇有人升等时,则会到先生家附近的餐厅聚餐庆祝。每一个聚会的短暂午后,都是温馨的时光,我们说着各自的生活和研究现况,有时也会评论一些学校发生的事。先生总是在旁抽着烟,静静地听着,让我们畅所欲言,偶尔所作的回应和评议往往能让我们茅塞顿开。每当我们向伫立在门口的先生挥手道别时,心里特别地充实和愉快,仿佛充了电一般,又有了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。

先生家位于台北植物园旁,前为一由植物园延伸出的荷塘,环塘植有多棵柳树,景致宜人,每次从喧闹的马路转进先生所居的巷弄,顿时摆落了尘嚣,感受市井中少有的宁静。喜和自然相亲的先生与此居家环境最为相衬,有时兴致高时会带着我们到植物园游赏,但自从园内风格日益趋于人工化后,先生便不复游园。而先生居宅亦有一小园,种植多种花



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后,廖蔚卿多次返乡,图为与妹妹们的合影。

木,其中靠墙一排为木槿,至秋花开灿烂,先生在我们造访未进门时,总会引领我们绕小园一圈观赏,有时先生还让我们带回植物栽种。然而,随着先生日益年迈,庭园也渐渐荒疏。2009年9月3日,先生因脑溢血跌倒在园中,送医抢救数日无效,与世长辞。荷塘柳树旁屋宇扬扬师生言笑之声,戛然而止。台北市和平西路75巷先

生的宅第,成为我们再也入不的“黄公酒垆”。

先生生性恬淡,不喜交游,行事颇具魏晋名士风骨,生于世事迍邅之际,有鉴于恩师台静农先生及同窗萧明华女士因故或身系囹圄、或失去年轻生命,深感于个人生命受制于时代种种不得已的哀痛,其致意于六朝名士的心态及处于南北分裂的庾信研究,实寓有深意焉。先生对于双亲及

兄弟姊妹八人亦因海峡局势分隔两岸的际遇,尤感痛心,常在言谈间叙及过往与父母和兄弟姊妹相处之情景。到先生家聚会时,先生常常拿着一把古朴的小刀为大家削水果,有一次她不经意地说出这把刀是她母亲的旧物,先生对至亲的思念,实溢于言表。1987年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,先生多次返乡与兄弟姊妹团聚,一圆长年期盼的天伦梦,同时先生也趁返乡之际探访了她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挚友们,那是先生晚年除了含饴弄孙外,最为愉悦之事。先生过世后五年,先生的五弟、七妹犹携后辈,特意来台大中文系探访先生的第五研究室,可见其手足情深之一斑。

先生于就读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时亲炙台静农先生,复受台先生青睐延聘至台大中文任教,师生情谊逾五十年。先生为学行事亦深受台先生之影响,衡酌是非实清明有序,臧否判断则涵养于内,台先生过世,先生不曾撰写只字片言以为纪念,唯于台先生逝

世纪念座谈会中娓娓追述台先生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学、生活之情状,特别叙及抗战胜利后、学院搬迁时,台先生一家困顿之景况,怀思之情令人动容。先生复保留台先生书房之座椅,置于一己书桌之前,日坐其上阅览群籍,可见其对台先生忆念之深切。如今先生离世近十年,虽无一椅可以让我辈凭借追思,然先生曾云:“深知教学相长之义,在教育青年和子女的工作中,笃学以教育自己为一生职志。”其笃学自励,怀持教育他人实教育自己的觉知,从事教育工作,不仅为传授知识之经师,更是熏染人格之人师,先生如此之精神遂将永铭于学生内心。钟嵘于《诗品》中对古诗十九首作了“人代冥灭,而清音独远”的评论,于笔者而言,先生行谊风范依然清晰如故,且深信其定能与先生之学问文章共同传之久远,而予后人深刻的启示。

(作者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)